

# 論谷物法的影响 地租的性質与发展

〔英〕馬尔薩斯著

何 宁 譯

商 务 印 书 館

31

61

# 論谷物法的影响 地租的性质与发展

〔英〕馬尔薩斯著

何宁譯

商 务 印 书 馆

1962年·北京

*T. R. Malthus*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CORN LAWS**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論 谷 物 法 的 影 响  
地 租 的 性 质 与 发 展**

[英]馬尔薩斯著 何宁譯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装

(K Z) 统一书号: 4017·22

---

1960年5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50千字

印张 2

印数 3,001—5,000册

定价(9) 0.30 元

## 出版說明

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出身于英國資產階級的土地貴族家庭，1798年以寫反動的《人口原理》一書而出名，其后，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寫了許多經濟學著作。這些著作，或者是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立場反對勞動人民，或者是在土地貴族的利益同資產階級的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站在土地貴族的立場反對資產階級，同時又瘋狂地反對勞動人民。《地租的性質和發展的研究》和《論谷物法的影響》屬於后一種情況。

馬爾薩斯的這兩部著作，前者出版于1815年，后者出版于1814年(這兩本書的內容比較相近，中譯本合出一冊)。當時，英國的產業革命為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开辟了廣闊的道路，資產階級為了獲得高額利潤，需要進行巨額的積累。但土地貴族在政治上、當時仍然占着優勢，他們利用國家權力不斷抬高谷物價格，從中攫取地租。這對工業資產階級十分不利。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蒲加南等人於是起來攻擊土地所有者。他們認為地租是土地獨占的結果，它的存在只對土地所有者有利，對消費者則有百害而無一利。昂貴的谷物價格使工資提高，利潤降低，而地租的上漲，更使資本積累減少。面對着資產階級的攻擊，土地貴族需要為自己辯護。馬爾薩斯的這兩部著作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寫的。

《地租的性質和發展的研究》是馬爾薩斯的一部主要著作。在這部著作里，他竭力想證明地租是自然、上帝對人類的賜予，而不是土地獨占的產物。什麼是地租呢？他說，地租就是總產值扣除耕種土地的各种開支(包括農業資本家的利潤)以后留歸土地所

有者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余额是怎么来的？他说，一个是由于土地和生活必需品的自然“品质”。上帝赐给了土地一种好的“品质”，使得它能够生产出许多东西，这些东西除了抵偿农具、种籽、农业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以外，还有一个余额，这个余额就构成地租。再一个是由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发生作用。世界上肥沃的土地比较少，在这些土地上连续增加投资，不能够相应地增加收入，于是农业投资不得不由肥沃的土地扩大到贫瘠的土地上去，由于供求关系，农产品的价格要由最贫瘠的土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在每一个进步的国家中，产品的价格必须刚好大致上等于实际已耕的最贫瘠土地的生产成本”（本书第43页），这样，最贫瘠的土地只能收回生产成本，使农业资本家得到一份利润，不能提供地租，而比较肥沃的土地则能够得到较多的收入，程度不等地提供地租。

他进一步“论证”，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租不可避免地要增长。社会进步以后，农业改良了，生产成本跟着下降，农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就扩大了。生产发展了，对于粮食、农产原料的需要增加了，农业投资日益由肥沃的土地向贫瘠的土地扩展，农产品的价格也就要不断上升。……所有这些，都会使地租跟着不断上涨。因此，他认为地租的增长并不象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讲的那样有百害而无一利，而是同社会发展的趋势一致的，是符合一切消费者的利益的。对劳动者来说，地租的增长，可以刺激农业发展，增加农产品的产量，社会供养人口的能力和对于劳动的需求都会跟着增长，而劳动需求的增长是劳动者的“最主要”的“福利”！对资本家来说，地租的增长意味着农业投资和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这也就是表明“依靠资本利润这种更重要的剩余为生的人的数目和财富增长”（本书第52页）。

马尔萨斯的这一套谬论的用意是很明显的。第一，把地租的

产生完全归于自然原因，把土地所有者的坐食高额地租說成是象地心吸力原理一样的自然法则，并且把土地所有者描写成对社会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阶级，从而抵制工业资产阶级对于土地所有者的攻击，特别是掩盖土地所有者对于劳动者的剥削。第二，为当时土地所有者要求的保护关税辩护。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限制国外廉价谷物进口，人为地维持英国国内谷物的高价格，可以使土地所有者得到更多的地租收入。马尔萨斯想为这种政策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国内谷物的高价格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不应该反对实行谷物法，反对也是徒劳无益的。第三，为他的极端反动的人口理论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但是，这种谬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們知道，资本主义地租是农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由农业资本家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一部分超额利润。因此，地租反映土地所有者对于农业工人的剥削关系。它的产生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和土地经营的垄断，并不是什么自然对人类的赐予。比较肥沃的土地能够使同样的劳动生产出较多的农产品，但是如果沒有农业工人的劳动，什么地租也生产不出来，沒有土地的垄断，这一部分超额利润就会留在农业资本家手里，所以把级差地租的产生归结为自然原因是错误的。贫瘠的土地固然不能提供级差地租，但是因为农业有机机构成比较低，农业投资的利润率比较高，农业资本家仍然能够得到一部分超额利润，由于土地垄断的存在，这部分利润作为绝对地租交给了土地所有者，因此贫瘠的土地仍然能够提供地租。马尔萨斯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掩盖地租是土地垄断的结果这个铁的事实。

不错，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能够产生一种级差地租，但是这决不是什么“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土地的肥力是随着生产方

式的改变、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增进的。由于社会需要的增长，比較貧瘠的土地确实会和肥沃的土地一样逐步投入生产，但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这种土地比起从前的肥沃的土地，还是相对地肥沃的。对于一定範圍的土地进行大規模的投資，經常是同新技术的采用、土壤的改良等等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土地的肥力、收益不是递减，而是逐步上升的。所以以土地肥力的递减来解釋地租的产生，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指出：“地租法則，……决不是以土地丰度的减少为前提，而只是以这个事实为前提：尽管社会发展了，土地丰度跟着会一般增加，但各种土地仍然会有不同的丰度，或者連續投在同一土地上的各个資本仍然会有不同的結果。”<sup>①</sup>馬尔薩斯从資產階級經濟学者安德生那里盜用所謂“土地肥力递减規律”，除了想“論証”地租出自自然原因，还有一个极为反动的企图：土地肥力在减退，自然界对人类的賜予在减少，从而人类生存更加困难了，为要避免貧困和罪恶，不是要經由社会主义革命改变資本主义制度，而是要采取人为的办法来减少人口。針對这种謬論，列宁进行了严厉的駁斥。列宁指出：“机器和更完善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人类……进行食物生产容易得多了。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取得食物更加困难了，因为資本主义的发展抬高了地租和地价，使农业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資本家的手中，使更多的机器、工具和貨幣集中在資本家手中，而沒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順利地进行生产。說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賜物，这就是充当資產階級的辯護士。”<sup>②</sup>

馬尔薩斯以“土地肥力递减規律”来“論証”谷物价格提高、地

---

① 《資本論》第3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94頁。着重点是編輯部加的。

② 《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頁。

租增长的必然性,这也是一种完全荒謬的观点。新的土地(不管是肥沃的土地还是貧瘠的土地)由于社会的需要而投入耕种,往往会使农产品的价格趋于上升,并影响地租上漲,但这主要是因为耕种新的土地需要投入一笔开垦費用,这笔費用要計算进农产品的价格之中,并不是因为什么土地肥力减退了。另一方面,我們更要看到,由于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耕作費用比从前已經一般地趋于下降,因此农产品的价格又不可避免地要逐步降低。农产品的价格的这种降低并没有减少地租額,事实上,随着土地改良的普及,单位面积的产量在增加,从而最貧瘠的土地的生产成本和最肥沃的土地的生产成本之間的差額扩大,地租額还是在不断增加。但是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对于土地所有者保持高額地租总是一个威胁,所以他們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抵擋这个趋势,并竭力抬高谷物价格。馬尔薩斯关于谷物法所持的見解,就是为土地貴族的这种需要效劳的。

在《論谷物法的影响》中,馬尔薩斯竭力強調谷物自由貿易的弊害和实行保护关稅政策的好处。他認為允許外国廉价谷物自由进口会严重地危害英国的安全,妨害本国农业的发展,說什么开放口岸的結果,谷物价格降低,刺激人口增长,“下层階級的生活状况就会恶化”,而限制谷物进口則能使英国达到“自給自足”,給各个階級带来利益和幸福。因此,他主張“更为有效”地施行保护关稅政策,并繼續实行出口補貼制度。在《地租的性質和发展的研究》中,他对于保护关稅的重要性作了更加明确的論述。馬克思指出,馬尔薩斯的地租理論的一个实际应用,就是“辯护地主們在1815年要求的保护关稅”<sup>①</sup>。1815年議會通过的新的谷物法,正是土地貴族凭借刺刀和馬尔薩斯之流的辯护而获得的胜利。从这里,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馬尔薩斯的土地貴族的立場是何等

① 馬克思:《剩价值学說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299頁。



頑強。需要指出的是，他在这里不但是要在‘启蒙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資本之前，为反动的土地所有权辯护”，而且也是要“确認他以前为生产者的貧乏提出辯护的見解”<sup>①</sup>，所謂人口增长，“下层階級的生活状况就会恶化”的鬼話，正是他的反动人口論的一种翻版。

由上述可見，馬尔薩斯的地租理論和关于谷物法的見解，是同他的人口論紧密相关的。为了便于学术界深入地批判馬尔薩斯的人口論及其庸俗政治經濟学，我們特譯出这两本書，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参考。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1960年4月

---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295頁。

論 谷 物 法 的 影 响

兼 論

谷物价格的漲落对农业与国家

总财富的影响

## 論谷物法的影响

據說修改谷物法的問題即將由立法机构進行討論。對這樣一個問題作出決定時，應當對全部問題具有正確而開明的看法；這一點對於行將採取的措施是否鞏固，以及其日後效果如何，無疑都將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為這一決定所需要的資料貢獻微末的意見是無需多作解釋的。由於我國所採用的制度，這一問題已經成為經常討論的問題，看來誠然沒有多少新的東西可說了。但我盡最大的努力加以考慮後，似乎認為正反兩方面都有一些重要的理由被忽視了，谷物法以及谷物價格的漲落對於農業與國家總財富的影響，還沒有向公眾充分說明。

這一點如果沒有錯，那麼我在某種程度上就不免要歸咎於亞當·斯密博士討論谷物出口補貼時所提出的十分奇特的論調了。熟悉《國富論》的人都可以看出，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中雖然提出了大量明顯的、重大的、甚至是無可辯駁的理由來反對一切補貼和限制制度，但這位偉大的作者在這一點上卻完全把這些理由拋到一邊去了；他只突出地提出了一點，這一點按照原意是應當只應用在谷物方面的。

象這樣高的一個權威，能使爭論雙方都特別注意這一特殊論證，是不足為奇的。擁護亞當·斯密博士那種說法的人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幾乎完全一樣。反對補貼與限制制度方面有許多更普遍和更正確的說法他們也許提及了，但他們主要依靠的似乎差不多全都是有關谷物性質的那一條正好合式的特殊論證。

從另一方面說來，反對方面如果認為自己已經順利地把這一

特殊論證駁倒了，那么往往又容易認為這一問題已經成為定論，而不怎么顧及被拋在一邊的許多更有分量和更重大的論證。

我自己便不得不歸入後一類人中。我始終認為亞當·斯密博士的這一特殊論證基本上是錯了，並且認為，要坚持那種說法，就不能不同有關供求的重要原理相沖突，同時也會和貫串《國富論》一書的一般推理精神與格局相矛盾。

但我極願坦然承認，以往某次當我討論谷物法時，也是過分偏重這一特殊看法，以致未能適當地重視其他有關這一問題的論證。

我切盼糾正我所意識到的一個錯誤。但我目前並不打算對整個問題發表意見。我只是要站在完全不偏不倚的立場，盡力說明我個人認為兩種制度在我國目前的實際環境下究竟有何利弊；採用其中的一種制度時，預計會產生哪些特殊的後果。我主要的目的是幫助提供材料，以便作出公正和開明的決定；而且不論所作出的決定是什麼，當措施的效果與預期不符時，我也要防止人們感到失望。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如果在某一個時候得到了理論的支持，而事後又被確定不移的和不容懷疑的事實證明是錯誤的，其威信就將受到莫大的打擊，其傳播就將受到莫大的阻撓。

因此，我們必須首先探討一下亞當·斯密博士的論證是否正確，因為，如果這一前提沒有解決，我們就無法適當地進而討論主要的問題。

他的論證的主要內容是：谷物性質特殊，其真實價格無法因其貨幣價格的增加而有所提高；同時，顯然唯有實際價格的增加才能激勵谷物的生產，補貼制所引起的貨幣價格的增漲不可能具有這種效果。

我決不想否認谷物價格在相當長的年代中平均說來對勞動價格具有強大影響；但這種影響卻不足以阻止資本流入農田方面或

从农田方面流出，而这种流动却正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这一点只要略为探討一下支付劳动报酬和劳动进入市場的方式，并考虑一下采用亚当·斯密博士的主張后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哪些后果，就可以充分証明。

首先，我們如果探討一下社会上劳动階級的支出，就会发现其項目決不全是食物，当然更不止是面包或谷物。在弗烈德利克·墨頓·艾登爵士的《济貧工作》这一資料的宝庫中查考了一切有关价格与劳动的每一事物以后，我发现在一个人數中常的劳动者家庭中，房租、燃料、肥皂、蜡烛、茶叶、糖和衣服等項开支一般和面包或吃飯的开支相等。根据极粗略的估計，全部开支可以分成五份，其中两份是面包或吃飯的开支，两份是上述各項开支，一份是肉类、牛奶、黄油、干酪和馬鈴薯等項开支。这种分法当然会由于家庭人数和收入數額的多寡而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只要它能接近事实，那么谷物价格的上漲对劳动价格的影响便是緩慢的和局部的。肉类、牛奶、黄油、干酪和馬鈴薯所受谷物价格的影响是緩慢的，房租、磚石、木材、燃料、肥皂、蜡烛和衣服等則更緩慢；其中有些物品如皮革、亚麻織品、棉織品、肥皂和蜡烛等都全部或部分依靠外国原料，可以認為与谷物价格无关；其余如茶叶与糖兩項开支也是这样，虽然其數額是很可觀的。

因此，整个的劳动工資显然決不会和谷物价格的变动成比例地漲落。这些变动所产生的效果，不論大小如何，其作用总一定是十分緩慢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劳动供应的方式得到証明，而我們对这种方式一向是注意不够的。

商品价格的每一变动，如果任其求得自然水平，便是由供求状况实际发生的变动或估計将要发生的变动所引起的。消費者之所以对任何制成品付出額外价格，或对其任何組成部分支付增长的价格；是因为他如果不願或不能支付这一增长价格时，商品供应量

就不能照旧保持；第二年市場上的商品量就只能适应于願意付出这一額外价格的人数。但劳动这种商品撤出市場的作用便要緩慢得多和痛苦得多。虽然購買者拒絕付出增长的价格，市場上必然会仍旧保持同一供应量；这不仅第二年如此，未来的若干年都将如此。所以，如果需求沒有增加，而粮食价格又沒有增长到使劳动者显然不能贍养其家屬的程度，那么可能的情况是，劳动者將繼續支付这一增长价格，直到人口增长率的減緩使市場上的劳动供应不足时为止。这时購買劳动的人相互的競争，当然会使劳动价格上涨到超过食粮上漲价格的程度，以便恢复供应。同样的道理，劳动价格在連續两三年的大荒年中上漲后，当年景恢复时，劳动的真实报酬仍可能繼續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直到后来，人口增长过快，又使劳动者之間发生競争，从而使劳动价格降到一般工資率以下。

谷物价格究竟将怎样根据人口发展規律对劳动价格发生作用，已如上节所述。从这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谷物和劳动很少以一致的步伐同进退，而是必然会經常差着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的数量，使資本可以改变方向。

其次，为了进一步証明这一真理，再考虑一下采用亚当·斯密博士的主張后必将发生的后果，也許是有用处的。

如果我們假定，谷物的真实价格是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說，相对于劳动和其他商品說来，其价值不可能发生变化，那么亚当·斯密博士闡述得十分美妙的一条原理馬上就不能应用于农业方面了。这条原理是，資本将根据社会的种种必然发生波动的需要而从一种生产事业流入另一种生产事业。这样說来，谷物的增长在从古到今的一切国家中，便都是以划一不变的步伐前进的；它只能由农业資本的均匀增加所产生，而不可能受到需求变化的促进和阻滯。同时，如果一个国家谷物过剩或不足，便也不会有牟利的动

机使人在前一种情形下将资本从农业中撤出，或在后一种情形下增加农业资本，以便恢复其各种产品之间的平衡。主张劳动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完全直接受谷物价格控制，就会无可置辩地得出上述的结论，但这些结论却直接和一切实际经验相冲突，因而理论本身也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确信，谷物价格对其他商品的影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那样直接和那样完全，以致使这种物产单独成为一种例外。

《国富论》一书中所有的一般推理都蕴含着一点，即谷物方面不可能有这种例外存在。亚当·斯密博士显然已经领会到了这一点；因此，每当他不把问题从谷物的交换价值转移到谷物的物理性质上去时，他的说法就非常含糊，并且用“十分”、“在任何较大的程度上”等字眼来说明他的论点。但必须记住的是，这一论证加上这些说明后提出来时，明明白白是为了证明：一般公认为补贴制度刚建立时所引起的价格上涨，只是名义上的上涨，而不是真实的上涨。我们在这儿所要明确说明的是：补贴谷物出口和限制谷物入口所引起的价格上涨，决不可能比年成坏、人口增加、商业财富迅速增长或任何其他自然原因所引起的同量价格上涨更不真实。亚当·斯密博士的论证加上那些说明以后如果对其提出的目的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同样也可以适用于自然需求所引起的价格增长。

我们不妨假定，谷物需求量和价格由于对外贸易和工业特别繁荣而增长了，这是我们经验中常遇见的事。根据《国富论》中的普遍原理和供求原理说来，谷物价格象这样增长以后，就会给予农业一个决定性的刺激。这样，投到土地上去的资本就会比往常来得多。在过去二十年中，我国的情形显然就是这样。但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特殊论证说来，上述情形却不可能对农业产生这种刺激。因为据说谷物价格上涨后，劳动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

馬上就会跟着成比例地上漲。农业資本家和地主每一夸特谷物所得的价格平均說来虽然可能由六十先令增加到七十五先令，但农业資本家也不会能够更好地耕种土地，地主也不会能够生活得更好。因此，一国的資本根据利潤变化而在不同的生产事业間分配的原理看起来便不能运用于农业方面了；同时，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价格增长都不可能使谷物生产有重大增长，也不可能使大量的資本用于农业方面。

但見過农田方面情况的人的經驗，以及农户与地主对行情的預感和行动都大大地否定了这种推理。

亚当·斯密博士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系列論証，显然是由于他习惯把劳动当作价值的标准尺度，同时又把谷物当作劳动的尺度。但谷物作为劳动的尺度而言是极不准确的，我国的历史就提供了充分的証明。如果研究一下我国的劳动和谷物的对比情形，就会发现劳动的逐年变化、百年变化以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合起来的变化，都是十分巨大而又惊人的。<sup>①</sup> 而且劳动或任何其他商品也不可能成为真实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現在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經成为最无可置辯的原理之一了；同时从交换价值的定义本身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必然的結論。但一經承認谷物决定一切商品的价格，便立即把它当成了真实交换价值的标准尺度。我們要不否定亚当·斯密博士的說法，就必须承認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却是存在的；同时还要承認，一定量的谷物不論其供求状况必須經受的波动是什么，也不論一切和它作比較的商品的供求必須經受什么波动，它在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時間內，按几年平均的情形說来，都可以購買等量的劳动和等量的生活必需

<sup>①</sup> 从爱德华三世当政到亨利七世当政之間，一天的工资用谷物計算时，从一配克(合9.092公升——譯者)漲到将近半蒲式耳(合18公升左右——譯者)；但从亨利七世至伊丽莎白末年，則从将近半蒲式耳降到半配克多一点。



品与享用品。

政治经济学中有两条明显的真理往往成了错误的根源。

毫无疑问，如果国内外每一种商品都严格地按比例缩减，那么每夸特谷物不论是二十先令还是一百先令，都可以同样成功地栽培，而且也会有同样多的资本投到土地上去。同样地，下述情形也完全是正确的，即国内外每一种交换中，如果现在用五先令的地方都改用一先令，该国的工业与资本仍将完全不变（在银币上至少有一点小小的例外情形存在）。

但如果根据这些真理推论，说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使谷物或白银的价值上涨或跌落时，都可以认为完全没有关系，那便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实际上这两种价值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不可能不产生长期的和暂时的效果，大大地影响到财产的分配和特殊商品的供求关系。美洲的银矿发现后，谷物价格上涨到原值的三至四倍，而劳动的价格却上涨不到原值的两倍；这种发现使一切固定收入的购买力不断下降，但却使一切地主和资本家的财力惊人地增长起来。同样的情形，上一世纪将近中叶的时候，谷物价格下跌了（姑不论其原因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却是劳动价格的上升而不是下降；相对地说来，这一定曾经大大地妨碍资本投到土地上去，而且也曾给人口一个强大的刺激。人们准确地估计到这种情况要产生后来所经验到的事实，使我国从一个粮食出口国变成一个粮食入口国。

对于亚当·斯密博士的论证说来，单是认为谷物价格在完全相同的供求状况下决定劳动价格是不够的。为了使这一点符合他的目的，他还必须证明谷物价格或白银的价值由于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而上涨时，将不致改变财产状况，也不致改变谷物与劳动的供求关系；这种论点是和每一种所经验的事实相冲突的。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看，再明显不过的一